

访谈

艺术要对现实提出质疑

——卢昊访谈录

□刘 淳

卢昊 1969年2月出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2009款法拉利跑车全球限量版惟一设计师,2009至2013年任巴黎市政府外方艺术顾问。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参加各种规模的艺术展,如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里昂双年展和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等一系列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展览,并举办过10余次个人作品展,作品被很多博物馆、美术馆和画廊收藏。现生活、工作于北京。



儿时的记忆对我的艺术创作有着极大影响

刘淳:应该说,在中国艺术圈里,你活得非常潇洒,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艺术家的生活。另外,你也是首位与法拉利合作的中国艺术家。

卢昊: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一个标准和界限。衣衫褴褛、食不裹腹吗?好像毕加索、安迪·沃霍尔、杰夫·昆斯、卡特兰等许多艺术家活得都不错。与他们相比,中国艺术家算是简朴的了。我喜欢速度与激情,在平静的内心中保留一点不羁。

刘淳:其实,你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所以你的生活、情感与北京的历史民俗甚至习俗,都有着此生难解的暧昧关系。

卢昊:是的,我祖籍北京,我是旗人的后裔,爷爷是满族镶黄旗,奶奶是正白旗,我的祖父母两家是世代联姻的,据祖父讲我的曾祖父是正二品的尚书,我是我曾祖母带大的,我家是四世同堂。我曾祖母90多岁才去世,所以我看电视剧《大宅门》的时候,一直觉得那简直是在演我的曾祖母。

刘淳:你从小就生活在老北京的四合院中,北京的人文和地理、民俗和生活情调给你的生活和心灵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记忆一直伴随着你慢慢长大。它对你的艺术是一种怎样的影响?

卢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对我的艺术创作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邻里间祥和的关系、蛐蛐的叫声、鸽哨的飞鸣,以及由远及近的小贩子吆喝声,是那么的令人回味和神往,这是没有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人无法体会的。我1999年入选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的作品,当然也是我的代表作《花鸟虫鱼系列》,就是与我儿时的生活有着很多联系的。记得那时我家住一个四合院,爷爷养了将近17盆金鱼,还有一个小型的鱼池,家里还养了很多的花儿和鸟儿,这些都是伴随我一起成长的。

刘淳:对于一个艺术家,人生经历非常重要,谈谈你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

卢昊:是我曾祖母带大的,从小听她给我讲了很多京剧里的故事,也讲了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如《岳母刺字》《四郎探母》《赤桑镇》《铡美案》等等,从京剧的唱腔到故事的结构一一讲给我听,虽然那时我似懂非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的传承。我的记忆到现在还那么清晰,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童年。我曾祖母一生也有很多的故事和坎坷,她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实际行动来为这个家庭做出了表率。记得曾祖母去世的时候,爷爷给我们讲起她的故事,我们家有历代看护祖坟的满族老人,每年到清明时就在我家,并且告诉我们家坟地的草都被拔过了,又培上了新土。实际是到了该给钱的时候,我曾祖母没有告诉自己的儿子,因为那时家里已经困难了,自己把一件貂皮衣偷偷当掉了,然后把钱分给那些看坟的老人,自己穿一件单衣过冬。这些事情是儿子们后来才知道的。她还有很多故事,对我们家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合作法拉利:我喜欢简单的做事方式

刘淳:据我所知,2009年夏天法拉利代表找到正在威尼斯双年展做中国国家馆策展人的你,提出合作打造法拉利中国限量版的想法。后来你设计出了宋代哥窑开片瓷纹的图案,打造了法拉利中国限量版599。这种独具中国元素的设计获得了极高的荣誉,为什么会选择宋代哥窑开片瓷纹?

卢昊:是的,这是法拉利建厂60年来第一次找了一个外国艺术家合作设计,这辆599GTO的中国限量版,也是第一次允许除了法拉利的设计师宾夕法尼之外的另一个人的名字上了法拉利的车身,在此之前是绝无仅有的,也算是一种荣誉吧。到了意大利为了显示厂方的诚意,他们宴请我,并特意安排在歌唱家帕瓦罗蒂先生的家里,还由帕瓦罗蒂的私人厨师亲自下厨,也拿出了帕瓦罗蒂珍藏多年的红酒来招待我。这可是极高的规格了。选择哥窑的原因是这样的,首先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宋瓷,喜欢它素雅的釉色,不似青花那般花哨,你必须仔细地观察,方能感觉它的高级品质,这也是我选择哥窑

开片瓷纹作为这辆车的图案的重要原因。

刘淳:早年你在中央美院的专业是中国画,后来又做装置,这个转变和跨界其实挺大的,能具体谈谈吗?

卢昊:我喜欢国画传统的人文精神,我厌恶现在一些国人打交道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与这种方式格格不入,我可以理解的传统文化的精髓来创作作品,但社会上,那种人与人交流的方式在我看来简直是浪费时间。我选择用我更喜欢的方式来生活与创作,跨界与顶级品牌合作只是别人对我的一种选择和认可,合作简单,我喜欢简单的做事方式。

刘淳:早些年,你凭借杂糅建筑、社会和生活方式等命题创作了《花鸟虫鱼系列》,由此一举成名。作品多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国际上重要的展览。你选择了花鸟虫鱼,与你儿时的经历和记忆有关吗?

卢昊:当然有关。这种潜移默化的创作肯定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联系的,对我来说,只有我生活的环境才会让我有情感的投入,建筑类语言创作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延续的一个思路,一直没有变过。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与自己的人生态度。

刘淳: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应该用中国的形式去搞当代艺术”,这句话很精彩,也很有道理。你所理解的“中国的形式”是什么?

卢昊:中国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外一种文化结构和文化形式以及意识形态。中国人对审美的理解也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如宋代绘画的美就是中国文化形式的代表。我所理解的“中国的形式”就是作品中具有的中国精神。这其中存在的一种“深度体验”,正是在中国艺术精神的烛照之下,让我们耳目目睹了事物,我们的心灵得以体验。其实,正是个体得以保全自我和展示自我的一种途径。另外,这种“中国的形式”并不是简单的外貌,更多的是完成一种内心的真和自我的修炼和调剂,就像练习、打坐、辟谷,这些中国式的修行方式一样,是一个自身文化的形式和自我完备、自我纯化、自我消遣的过程。

刘淳:你还说过:“现在很多中国艺术家都在回避中国符号,刻意削弱中国特色而追求所谓的文化接轨。我和他们不一样。我绝对不能削弱中国的文化特征。如果削弱了,中国艺术家对自身文化的贡献将如何体现?”在这几句话中,我感受到你对中国文化有一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卢昊: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有最朴素的情感,要有自己独特判断问题的视角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只对自己的内心呐喊就够了。

刘淳:2008年,你在北京公社举办了一个以《风景》命名的个展。将服装店里摆放的帽子、鞋、袜子、领带、裤子等,还有饮料、饼干、音响等许多日用品,以近乎超写实的方法全部挪到了画面上。在你看来,这些物品在当下社会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风景。你是要为“风景”找出一种新的可能性吗?

卢昊:是这样的。比如像马远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所面对的风景和自然,与我们今天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中国绘画可以为当代中国人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景吗?我说的风景,不是传统观念中的风景,所以我努力尝试着,也希望这道风景能准确地记录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实,包括我们的现实处境。

一个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文化创作中国当代艺术的非著名草根艺术家

刘淳:从你的成名作《花鸟虫鱼系列》到《消失的家园系列》再到《风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中国式的政治符号在你的作品中逐渐消失。几乎看不到任何政治的影子,你是在有意淡化政治因素。

卢昊:是的,我是有意淡化这种政治因素,因为我不想用政治符号作为艺术作品的商标,伤口也有弥合的时候,不能总拿政治说事,也不能总拿政治“炫耀”。

刘淳:我也曾经想过,在作品中过于强调政治符号,不但不能强化作品,反而会削弱作品的表现力。

卢昊:是的,削弱的不仅是作品的表现力,其实在我看来,削弱的还有艺术家内心世界中丰富的个人情感。尤其在视觉艺术中,这一点非常重要。没有情感,谈何艺术。

刘淳: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系统中,你的自我定位是什么?

卢昊:我的自我定位是一个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文化创作中国当代艺术的非著名草根艺术家。其实,我很反感有些文章说自己是什么国际型艺术家,什么国际知名艺术家等等。你一共才参加了几个国际性重要展览,就国际艺术家了?再说,什么是国际艺术家?你的视野在哪里?你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自己知道吗?在我看来,给自己定位草根很好,人参、灵芝这些东西不都是草根吗?当然,它们不比温室大棚里的黄瓜、胡萝卜、茄子和西红柿的颜色鲜艳。

刘淳:2009年,你成为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人,直到展览结束,各种声音铺天盖地。后来你还说过一句话:“我经历过电视剧《潜伏》中所有的过程。”为什么与《潜伏》联系在一起呢?

卢昊:只是一句玩笑而已,说明其中的艰难和甜酸苦辣。在中国,做事就会得罪人,做事求全则更难。但是只有通过做事情才能看出人性来。得失都是一种历练,感谢上苍对我的眷顾,我又成熟了。抛去胸中荆棘以便人来我往,难道不是天下第一快事吗?我劝某些同行朋友:艺术家最终是靠作品说话,那才是正理儿,别的都是假的。

刘淳:作为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策展人,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卢昊:最大的感受是做策展人不容易。好在展览顺利开幕,艺术家们的作品顺利完成并正常展出。虽然整个过程有些坎坷,但还是比较顺利地过来了。正如艺术家邱志杰的一句话,我颇感精彩。换个角度看,人生再大的坎坷,不过是一道纹理罢了。

刘淳:我们谈谈你的装置艺术,你选择的材料主要是有机玻璃,做工精良,效果雅致,玲珑剔透,有一种非常精致的感觉。你是在有意强调这种效果吗?

卢昊:当然。在我看来,艺术家的性格和情感应该如同他的作品雅致、晶莹、透彻才是。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我觉得做人如此,作品亦应如此。

刘淳:在你的装置作品中,用有机玻璃精心构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建筑:如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等,并且将这些建筑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行消解——用来养鱼种花。在我看来,你针对的是建筑具有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是不是这样?

卢昊:这不过是物尽其用罢了。

刘淳:你的作品无论是绘画或装置,它是你的一种经验的经历,不是他者的目光。它是日常的、记忆的,也是心灵的历史触动。关键它不是转述或编织或借鉴的故事情境。也许在你的童年、少年乃至成年生活中,本身就有那些四合院里的金鱼、胡同里的蟋蟀甚至胡同以外的花草,那些个人化的生活岁月与北京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中心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当历史记忆与现实处境发生碰撞时,你就会豁然开朗,新的语言方式由此诞生……

卢昊:完全是这样。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觉得创作内容就在你的生活里,你无需到山南海北去瞎转,去寻找,去体验所谓的生活。其实它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周围,就看你是否有眼,还是根本无珠……我觉得,我的人生经历、生存处境和生活环境都给了我无数的创作灵感,俯拾皆是,而且我从未对此有过苦恼。有经历就有记忆,有生活就有情感,而且源源不断地。在我看来,这就是作为草根的美妙之处。

刘淳:2005年以后,好像你又回到架上绘画上来,描绘的主要北京四合院和北京胡同。我觉得它是你的某种忧伤情怀的全新表达。那种散发着浓重的怀思与伤感的作品背后,我看到的是你面对日益消失的家园的一种无可奈何与绝望。

卢昊:是啊,每日面对的只能是破碎的记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切肤之痛。而我想,这种痛苦是真实的。只有成长于此,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这种体会不是追逐时髦的装腔作势,如果你没有生于斯、长于斯的经历,你的情感从何而来?所以,有些人的创作与艺术家本人的经历与生活没产生联系时,你会怀疑他的创作能力,甚至怀疑他的创作能力。所以我只能说,我的作品表达了我的一点感受,那叫乡愁。也

许,这种乡愁在我的生命中是永远挥之不去的。

刘淳:中国的艺术问题,很多时候不是艺术自身的问题。你觉得目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

卢昊: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包容和宽松的创作环境,允许艺术家张扬的性格得到释放,换句话说,对艺术家的个性和那种放荡不羁给予包容和理解,这样才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在我看来,有缺点和个性的艺术家才是真正艺术家,才是活生生的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个性、真诚并可爱的、悲天悯人的艺术家。

刘淳:中国当代艺术近几年遭遇很多指责、质疑甚至是咒骂,与艺术家在创作上远离现实、丧失社会批判性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很多艺术家逃避真实,不敢直面社会问题,艺术家整体上平庸,缺少创造活力,也缺少精彩的表达,当然,更缺少好的作品。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和意见。

卢昊:前几天,我与日本批评家丰田先生闲谈,他是当年力推物种的批评家之一。他告诉我观念艺术已死,我告诉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死亡都是因为缺少出色艺术家的缘故,所以观念艺术不会死。只是您没有看到出色的艺术家罢了。如今,眼花缭乱的数码产品和频繁的商业活动,使很多出色的艺术家和艺术家被埋没。不过不用担心,好的作品和艺术家是不会被长期埋没的,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淡定,以及耐心等待。

一件成功的作品有时需要一生的时间积累

刘淳:在当代艺术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卢昊:最重要的是对现实提出自己的质疑!

刘淳:中国当代艺术最困惑你的东西是什么?

卢昊:中国当代艺术最困惑我的是,不懂当代艺术的人太多,对牛弹琴是一种境界,同时也是一种痛苦。中国当代艺术还需要花时间去培养观众,培养读者。

刘淳:对你和你的作品,我一直在想,其实你已经将艺术的事情变成人生的事情。尤其在你的《花鸟虫鱼系列》中,你将自己的关注与思考变成艺术的主题。重要的是,你为这个主题找到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并且让它成为服务于思想的工具。

卢昊:是的,这句话说得好。我想任何一件成功的作品都会有很多必备的条件,也有很多铺垫和准备。当然,有的准备是用一生的时间积累的。

刘淳:从你的作品中我能看得出,你的思想是独立的,有一种把艺术与人生打成一片的境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卢昊:我认为艺术家的乐趣是在创作中。能有时间与自己的作品交流并独立的思考,难道不是人生一件很快意的事情吗?

刘淳:观看你的作品,我感觉到你把自己与社会的某种对立表现得轻松而温润,让我们感受到力量的真正品质——它不在视觉的形式上,而在心灵的和谐之中。

卢昊: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起码精神状况与临床表现一致,才让人觉得可爱。

刘淳:你是一个在行走中不断发生变化的艺术家,我想“变”肯定是你一生不懈的追求,最近还有什么新的设想吗?

卢昊:我一直在想,老子一种事情难道不烦吗?当然,老靠一种东西赚钱也许不会烦恼。但我做不到。我必须得有新作品!这样才会好玩儿,也能活出滋味,生活也会新鲜。马上会有新的作品,都在创作中,不久将会与大家见面。

刘淳:艺术是无止境的,你的谨慎中体现出一种无所顾忌,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方式。你正值大好时光,也是直探胜境的最佳年华。希望你把更多的好作品奉献给观众,奉献给我们这个时代。

卢昊:头脑可能比以前更清晰一些。有些东西或许才刚刚开始,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去完成它。当然,后面有太多的未知和可能性,下一步的研讨和探索的方向也将渐渐明朗。随着很多社会行为和文化实践的展开,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多、更复杂。我相信自己的视野会拓宽,也会有更多的良性选择。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又能开放性地汲取良性的文化因素,这就是我的理想和愿望。